

导 言

今天，各个学科中的研究正逐渐认识到：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也正在逐渐意识到将语言分析用作研究社会变化的一种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还不存在一种既适合于理论，又适合于实践的语言分析方法。所以，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力求发展一种通向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致力于填补某种空白：它对于研究语言中的变化能够特别有用，而且也能够适合于研究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把两方面因素加以综合，一方面是在语言学和语言研究范围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分析语言的方法，另一方面是与发展一种适当的社会语言理论相关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在前者中，我的工作包括语言学的各个分支领域（词汇、语义学、语法）、语用学、以及更为主要的“话语分析”，而“话语分析”近年主要是由语言学家发展起来的（各种意义上的“话语”和“话语分析”都得到简略的讨论）；在后者中，我的工作包括研究 A.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L.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M. 福柯（Michel Foucault）、J.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 A.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成果。这样一种综合是期待已久的事情，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存在，这个目标直到现在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得到实现。一个因素是语言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分离状态，以及形式主义的、认识论的范式对于语言学的支配。另一个因素是：在传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缺乏对语言的兴趣，并倾向于把语言看做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诸如当访谈之类的语言资料被广泛使用时，人们往往认为，此类资料的社会内容可以在无需注意语言本身的情况下得到解读。这些立场和态度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在淡化，更多不同种类的理论 and 实践正在各种学科内部得到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社会理论中的一种“语言转向”，它导致了对语言的赞美，即把语言更多地看做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作为中心的角色。

~~~~~

在传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缺乏对语言的兴趣，并倾向于把语言看作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诸如当访谈之类的语言资料被广泛使用时，人们往往认为，此类资料的社会内容可以在无需注意语言本身的情况下得到解读。这些立场和态度现在正在发生变化。

~~~~~

因此，以前有关综合语言研究和社会理论的尝试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一群语言学家通过将“语义语言学”（哈利迪，1978 年）文本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的途径，发展了一种“批判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在稍早些时间的法国，M. 佩奇尤克斯（Michel Pêcheux）和他的同事开始探讨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它特别利用了语言学家 Z. 哈里斯（Zellig Harris）的研究成果，利用了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改造。这两种尝试都存在着缺陷，因为它们无法在此类综合的社会因素和语言学因素之间达到平衡，尽管彼此之间都具有互补性的优势和弱点。就前者而言，语言学分析和对语言文本的论述得到了完好的发展，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和“权力”范畴也是在几乎没有什么讨论和解释的情况下被使用的；而在佩奇尤克斯的工作中，社会理论比较深奥，但只是以非常狭窄的语义学术语来对待语言分析。而且，这两种尝试都建立在对权力关系的一种静态观点的基础上，过于强调语言文本的意识形态构成如何致力于再造现存的权力关系；而很少关注权力关系中的斗争和转化，以及语言在其中的作用。同样，重点都放在了将文本描绘为最终的产品上，却很少注意文本的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很少注意作为这些过程之特征的种种张力。结果，这些有关综合的尝试对于动态地——也就是在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过程中——研究语言来说，则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些方法的更加详尽的讨论，以及某些试图改进和发展它们的更加新近的相关材料，见第一章。）

和佩奇尤克斯一样，我在本书中尝试进行的综合工作将围绕“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话语”（discourse）概念。话语是一个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它们来自各种理论的和学科的立场（关于这方面的有些

论述，见范迪吉克，1985年；麦克唐纳，1986年）。在语言学中，“话语”有时用来指口头对话的延伸部分，以便与书写“文本”相对照。就此而言，“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并不像某种传统的做法那样，把语言分析限定为句子或更小的语法单位；相反，它们侧重于对话的高级结构属性（例如，轮流说话 [turn-taking]，或谈话的开始语和结束语的结构），或书写文本的高级结构属性（例如，某份报纸上的一篇犯罪报道的结构）。不过，更加常见的是，“话语”之被用在语言学中，要么是涉及口头语言的延伸部分，要么是涉及书写语言的延伸部分。除了保持对高级结构属性的强调以外，这种意义上的“话语”还重视言语者和被言语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也重视话语和书写的生产过程与解释过程，就像它也重视语言使用的情景背景一样。这里，“文本”（text）被看做是话语的一个向度：是文本生产过程中的书写的或口头的“产品”。（有关这种“文本和相互作用” [text-and-interaction] 的观点，见威多森，1979年。）最后，人们在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下使用着不同种类的语言，而“话语”也是为了这些不同种类的语言而被使用的（例如：“报纸话语”；“广告话语”；“教室话语”；“医疗咨询话语”等等）。

另一方面，“话语”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理论和分析中，例如，在 M. 福柯的作品中，话语涉及用来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因此，“医学”话语通常是健康保健实务的支配性话语，尽管和普通的“民间话语”的关系一样，它与各种整体论的（wholistic）“可供替代的”话语（例如，那些顺势疗法和针刺疗法的话语）也形成了对比。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体现在使用语言的特定方式中，体现在使用诸如视觉形象等其他象征性形式的特定方法中（见汤普森 1990 年）。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它们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例如，成为医生或成为病人），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另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历史变化：不同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结合起来，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一个当代的例子是艾滋

病的社会建构，在此，各种各样的话语（例如，性病学话语、“异族”文化“入侵”话语、污染话语等等）被结合起来，从而构筑了一个有关艾滋病的新话语。在第二章中，这一更加带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将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我试图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个努力的中心是把两方面的内容连接起来，一方面是这一更加带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处于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的、具有“文本和相互作用”意义的话语。这种有关话语和话语分析的思想具有三个向度，即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被同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文本”向度（the text dimension）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the discursive dimension）与“文本和相互作用”的话语观中的“相互作用”一样，特别说明了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的性质，例如，什么类型的话语（包括更具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被利用了，它们又是怎样得到结合的；“社会实践”向度（the social practice dimension）倾向于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诸如话语事件的机构和组织环境，话语事件如何构成话语实践的本质，如何构成（上面所提到的）话语的建设性或建构性效果，等等。

我应该做一补充说明，即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本”一词是就语言学非常熟悉的那种意义而言的，与其他什么意义没有关联，它指涉任何书写的或口头表达的产物，因此，例如一次访谈或一次谈话的抄本往往就会被称作一个“文本”。本书的重点放在语言上，因此是放在语言学文本上，但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做法是：将话语概念加以延伸，使之能够涵盖其符号形态，诸如视觉形象，以及作为文字和影像之结合物的文本，例如，广告中的文本（见霍奇和克雷斯，1988年）。我将使用不带冠词的术语“话语”，以指涉见于上述三个向度意义上的语言用法（例如，“社会主体的位置得以在话语中获得”），我也将提到“话语类型”（discourse types）——当人们进入话语时，将会利用它们，意指诸如“文类”（genres）和“风格”（style）那样的惯例。第四章中，在某些类似于社会－理论的意义之上，针对一种特殊类型的话语或惯例，我将开始使用带有冠词的“话语”术语（“一次话语”、“多次话语”、“有关生物学的话语”）。我还将论及特殊机构、

组织或社会的“话语实践”（以便与作为话语的一个以分析为特征的向度的“话语实践”形成对照）。

上面所概述的多向度的话语概念和话语分析的问题见于第一章至三章。第一章是有关话语分析方法的一种要评，这里的话语分析是以语言学为方向的，即侧重于文本和文本分析。我将论证说，这些方法没有充分地重视话语的那些至关重要的社会因素，要达到这样的重视，人们需要利用社会理论。第二章评述了 M. 福柯作品中的有关话语的诸如此类的社会观点，这位社会理论家对于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分析的话语分析的发展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章继续论证的是，更多地关注文本和语言分析，将会增加话语分析之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的价值。然后，第三章展示了我的多维方法，它将以社会为方向的话语观和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观综合起来，其进展趋向于我所称之为的“社会话语论”（social theory of discourse）。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这一方法得到了阐述，并被运用于各种各样的话语。

我在这篇导论的开头部分提出，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是更加宽泛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越来越是这样，但是这一主张需要更加详细的解释和论证。有关语言的社会重要性的观点并非是什么新颖的东西。最近几十年来，社会理论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赋予语言更加核心的地位（见汤普森，1984年）。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内，葛兰西（1971年）和阿尔都塞（1971年）都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现代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性，诸如佩奇尤克斯（1982年）等其他将话语确认为意识形态的突出的语言物质形式（见下文第一章；关于“再生产”，我的意思是一种机制，通过它，各种社会在不同的时代维持它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其次，福柯（1979年）强调了技术在现代形式的权力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的是，这一类的权力主要是在语言中得到昭示的（见下文第二章）。第三，哈贝马斯（1984年）已经注意到通过经济和国家“体系”所达到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殖民化，他根据语言的“交往性”（communicative）使用（它旨在生产理解）被语言的“策略性”（strategic）使用（它旨在成功，旨在使人们做事）的置换来认识这种殖民化。语言和话语在社会领域中的提升多方面地反映在某些作品中，例如关于性关系的作品（斯彭德，1980年），或关于媒介的作品（范迪吉克，

1985 年 b)，它们侧重于语言，侧重于将谈话作为其资料的社会学研究（阿特金森和赫里蒂奇，1984 年）。

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和研究是否承认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具有某种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以前没得到充分的认识，或者，这样的理论和研究是否实际上反映出语言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增加了。尽管这两者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我相信，在语言的社会功能方面，已经发生了一种有意义的转变，语言在主要的社会变化中的突出地位反映了这种转变，刚刚过去的几十年又成为这些社会变化的见证。在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不仅涉及语言，而且借助于语言实践中的变化被构筑到了一种富于新的意义的程度；或许，语言在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中日益重要起来的一个象征是，设计变化方向的各种尝试越来越包括改变语言实践的努力。让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首先，在许多国家中，近年出现了一股将市场延伸到新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的高潮；诸如教育、健康医疗和艺术等部门都需要重新建构、重新认识它们的行为，使之成为面向消费者的产品 and 市场活动（厄里，1987 年）。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这些部门的工作者的行为、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他们受到了冲击，冲击的相当部分构成了话语实践中的变化，也就是语言中的变化。例如，在教育中，人们发现自己处于压力之下，必须从事一些新的活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由新的（类似于市场行为的）话语实践所限定，并且必须在现存的（诸如教学的）活动范围内接受新的话语实践。这包括“改变”行为和关系的“名称”，如将学习者变成“消费者”或“客户”，课程变成“课件”或“产品”。它还包括对于教育的话语实践——教育所使用的话语类型（文类、风格等等）——的某种更加精细的重新构建，以及借助各种来自外界的话语使教育“殖民化”（colonization），而广告、管理和咨询等领域中的话语是外界话语的组成部分。

工业正再次向被称作后福特主义生产的东西转移（巴格利尔和拉希，1988 年；巴格利尔，1990 年），在这样的生产中，工人们不再是在一个无变化的生产过程中重复性地劳作的个体，而是作为团队的一员与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保持着灵活多变的关系。而且，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的雇员—公司的关系已经被管理部门看做是机能失调的东西；这些管理部门因此试图改变工厂文化，其途径是通过例如建立

各种机构，它们将雇员置于一种具有更高参与管理程度的关系之中，诸如“质量研讨小组”（quality circles）。将这些变化描绘为“文化的”变化并非只有修辞方面的意义：其目的是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工人们是“有创造力的”，有工作激情的，或者如同罗斯（Rose，MS）所说，是“自我操纵的”（self-steering）。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组织和文化中的这些变化就是话语实践中的变化。在工厂，语言使用作为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一个工具正变得更为重要。更具体地说，工人现在必须作为讲话者和倾听者进入到面对面的相互作用之中，进入到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在对白领工作甚至对最低层工作的近乎一切工作描绘里，现在都强调交往能力。一个结果是：人们作为工作者的社会身份正在逐渐地根据某些东西得到确定，而这些东西在传统上不是被看做是职业性的东西，而是被看做是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之物。这些变化的一个深刻特征是：它们是跨国的。诸如“质量研讨小组”那样新型的管理和设计模式是从经济上更加成功的国家（如日本）输入进来的，因此，在部分意义上，工作场所的话语实践中的变化逐渐地有了一种国际特征。所以，新的全球话语秩序的特色是日益增长的国际经验和地方传统之间的普遍张力。

就变化而言，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例子：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政治家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化，工作场所中、家庭中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由新的话语实践所构成的。进而言之，如同我上面所提出的那样，话语在社会变化中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对控制话语的关注是相吻合的：即在话语实践中造就出各种变化，使之成为有关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设计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话语技术化”（technologization of discourse）运动（费尔克拉夫，1990年b），在这场运动中，作为“政府技术”（罗斯和米勒，1989年）的一个类型，“话语技术”（discursive technologies）被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话语实践中进行研究、设计和提供培训——系统地运用于各种组织之中。从事“技能培训”的社会心理学家是这一发展的早期样本（阿盖尔，1978年）。诸如访谈或咨询等话语技术逐渐地被当做无须顾及背景的技术或技能，它们能够适应于各种不同的领域。而机构的话语实践（institutional discourse practices）正广泛地受到模仿，特别是，传统上属于私人领域的谈话

的话语实践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practices) 正在各种组织内部得到系统的模仿 (有关话语技术化的更加详尽的讨论, 见下文第七章)。

~~~~~  
我的目的是发展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 它能够作为一种方法为其他人所用, 以研究诸如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变化。

因此, 我的目的是发展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 它能够作为一种方法为其他人所用, 以研究诸如上面提到的那些社会变化。为了使一种有关话语分析的方法能够运用于诸如此类的背景, 有必要规定一系列最低限度的条件。我将评论这些条件中的四个条件, 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早先给出的方法概要做一点阐述。

~~~~~  
首先, 它必须是一种多向度的分析方法。我的三个向度的方法能够使得话语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到确定, 并使得文本的详细属性能够与话语事件的社会属性——它们是作为社会实践的特例——有机地联系起来。

其次, 它必须是一种多功能的分析方法。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有助于在知识 (包括信仰和常识)、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变化; 人们需要一种话语概念和分析方法, 以便致力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是有关语言的系统理论 (哈利迪, 1978 年), 它将语言看作是多功能的, 并认为文本同时能够描述现实、制定社会关系和建立社会身份。这一语言理论可以富有成效地与对某种东西的强调结合起来, 即强调话语的社会性的建构属性, 它出现在诸如福柯的社会—理论的话语方法之中。

再次, 它必须是一种历史的分析方法。话语分析应该侧重于文本构成中的建设性的或“表达的” (articulatory) 过程, 以及“话语秩序”的长期构造中的建设性的或“表达的”过程 (这里的话语秩序 [order of discourse] 是指特定机构——或者的确是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的全部结构)。在文本的层次上, 我根据“互文性” (文本交织性, intertextuality) 的术语来看待这些过程: 文本是通过其他以特定的方式连接起来的文本所建构起来的, 这些特定的方式依赖于社会环境, 并随着社会环境而发生变化。在话语秩序的层次上, 就某个机构或者就更宽泛的社会而言, 话语实践中的关系, 话语实践之间的界限, 逐渐地发生着改变, 其改变的方式与社会变化的方向相一致。

最后，它必须是一个批判的方法。话语变化、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介入其中的人来说，一般情况下并非是显而易见的。话语的技术化也是如此。“批判的”意味着将隐蔽着的联系和原因揭示出来；它也意味着调停，例如，为那些因为变化可能会处于不利状况中的人提供对策。在这种联系中，重要的是避免将话语变化想象为直线发展的、一以贯之的过程：在话语的文本和秩序的建构方面，存在着斗争，人们既有可能仅仅追随来自上述领域的变化，也有可能抵制或是搁置它们（见下文第三章和第七章）。

在总结这个导言的时候，我将对在第三一七章予以论述的话语变化做一简短的评论。第三章阐述了我对于以社会为向度的话语观和以语言为向度的话语观的综合。我在话语实践方面的分析论述侧重于互文性概念。不过，我在社会实践方面的分析论述侧重于意识形态概念，特别是侧重于霸权概念，这是就某种统治方式而言的，后者在异化、从属团体的合并以及一致意见的产生等基础之上。特定组织、特定机构范围内的霸权、某个社会层面上的霸权，都是在话语中产生，在话语中再造的，也是在话语中体现争夺和得到改变的。而且，在话语秩序的范围之内，可以看见以特定方式建构话语实践的过程，正是在那个范围里，话语本身作为（尤其是文化的）霸权的一种形式开始被认为理所当然，并赢得了广泛的接受。由于互文性概念和霸权概念的结合，使得第三章的框架成为研究话语变化——它与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有关联——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框架。在特定的实例中（即一个特定的“话语事件”中），利用哪些先前的文本和文本类型，它们如何被结合起来，统统有赖于话语事件如何与霸权和霸权斗争发生联系——例如，它如何与现存的霸权实践和霸权关系相抗争，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如何把它们当做既定的东西接受下来。第三章确立的关于话语变化的方法将两方面东西结合起来，一是一种文本和话语实践的观点，它来自巴库廷（Bakhtin），中间又经过了克里斯多夫（Kristeva）的互文性概念（巴库廷，1981年和1986年；克里斯多夫，1986年a），另一是一种权力观，它来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葛兰西，1971年；布西-格鲁克斯曼，1980年）。

第三章的框架在随后的章节中得到了阐述。第四章根据“明确的”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其他文本在一个文本中的明显

出现)和“互为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按照文本类型或话语习俗的结构来建构一个文本)之间的区别来论述“互文性”概念。我提出一种方法,用以把作为话语习俗的不同种类的“类型”、“话语”、“风格”和“行为类型”区分和连接起来。这一章还依据文本的社会分布及其所经历的变化来讨论互文性,并根据社会身份在话语中的建立来讨论互文性。第五章和第六章的重点是文本分析。这些章节强调词汇、语法、连贯性、文本结构、力量和文本的聚合等方面(有关这些术语见下文第三章)。同时也提出了具有多功能性质的话语分析观:第五章主要论述话语在构建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中的功能;而第六章的重点在于构建、再造和改变话语中的知识和信仰体系。第七章强调话语的社会实践向度,而且特别强调某些广泛的变化倾向——它们影响当代的话语秩序(话语的“大众化”、“商品化”和“技术化”),以及它们与社会变化和文化的变化之间的关系。

从第四章到第七章的变化分析以一系列领域和机构为特色,带有对于话语样本的详细分析。第四章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某种方式——大众媒介正在以此方式改变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这不仅涉及媒介话语中的论题问题——诸如把私人生活方面处理成(公共)新闻,而且在互文性的意义上,它也表现在私人领域的话语实践与公共领域的话语实践的结合过程之中,结果,媒介的某些部门使用了通俗话语的刻板形式。另一个问题是对服务业的压力,迫使他们将自己的服务视为商品,将自己的顾客视为消费者,这在提供信息和提供广告的话语实践的混合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五章,我讨论了专业工作者及其客户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的变化,重点在于医生和病人。我提出,医生和病人身份的变化、关系的变化是被人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认识的,是从正式的医学访谈变成更加具有谈话性质的咨询,这种方式可能把咨询的话语实践结合到了更加传统的医学话语实践之中。第六章包括来自两个产前保健小册子的样本,它们列举了产前过程的对比性描述。我继续讨论将语义变化作为试图影响文化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问题,特别涉及到撒切尔政府的一个部长就“企业文化”论题所发表的演讲。第七章回到商品化的主题,回到信息提供和广告宣传的混合过程,这一次涉及的是教育,用的是大学简介材料的例子。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说服读者相信这样的观点，话语分析是一种值得进行的有趣分析，并为读者提供从事话语分析的资料。第八章是本书的最后一章，它以一套用来进行话语分析的指南，将第三—七章介绍的材料综合在一起。这些指南涉及到文本的收集、撰写和编码，涉及到结果的使用，也涉及到分析。

第一章 话语分析方法

这一章的目的是简要地描述近年来若干流行的话语分析的方法，而描述本身又是作为我在第三—八章所要阐述的方法的背景和基础。话语分析现在成为一个异常多变的研究领域，在众多学科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析方法（其中有些方法为范迪杰克 [1985 年 a] 所述）。因此，本章对于这些方法的概括必然是选择性的。我已经选择了一些方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语言文本的分析与话语的社会方向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做法符合我后面章节的目的，即获得文本分析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分析的有效的、也是有用的结合。我对方法也采取了选择性的态度，侧重于它们的那些最接近于我在本书优先考虑的部分。

按照它们对于话语的社会指向的性质，我们可以把这里所考察的方法分成两组，即分为“非批判的”（non-critical）方法和“批判的”（critical）方法。这样一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批判的方法之不同于非批判的方法的地方，不仅在于描绘了话语实践，而且在于揭示了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揭示了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而在一般情况下，就话语的参与者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是不明显的。从根本上说，被我确定为非批判的方法是：辛克莱（Sinclair）和库尔萨德（Coulthard）（1975 年）用来描述课堂话语的方式；“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中的民族方法学工作；拉博（Labov）和范歇尔（Fanshel）的治疗式话语模式（1977 年）；以及由社会心理学家波特（Potter）和韦瑟雷尔（Wetherell）最近用来进行话语分析的方法（1987 年）。我所囊括的批判的方法是：福勒（Fowler）等人的“批判语言学”（1979 年），法国的某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是由佩奇尤克斯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上发展而来的（佩奇尤克斯，1982 年）。这一章的结论是对话语分析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总结，它们就来自这个概述，而总结本身将可以作为我自己在第三章中论述的方法的一个出发点。

辛克莱和库尔萨德

辛克莱和库尔萨德（1975年，另见库尔萨德1977年）致力于话语分析的某种普遍的描述性体系，但是他们决定以课堂为重点，因为这是一个正式的场所，其中的话语实践有可能受到清晰规则的制约。他们的描述性体系以一些单位为基础，这些单位作为系统语法的早期形式，被认为是彼此处于相同的关系之中（哈利迪，1961年）：存在着一个包括单位的“等级序列”，高级单位由低级单位所构成。因此，在语法中，一个句子是由若干子句构成的，子句是由词群（groups）构成的，如此等等。同样，在课堂话语中，存在着五个呈递减序列的单位——课，相互作用，交流，动议（move），行动。因此，一堂课是由相互作用构成的，相互作用是由交流构成的，等等。

辛克莱和库尔萨德对于“课”说得很少，但是的确提出一个“相互作用”的清晰结构。相互作用由交流所构成。它们由“边界交流”（boundary exchanges）——这种交流在最低程度上，要由“构架式动议”（framing moves）构成，不管有没有其他动议的出现，都是如此——开始和结束，例如，“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做三个测验”，这句话就是由一个构架式动议（“好吧”）和一个“聚焦式动议”（focusing move）（它告诉上课的人这里的相互作用是关于什么内容的）所构成。在边界交流之间，通常有一个“告知”、“指导”或“引导”交流的序列，在此，陈述和要求（或命令）被分别做出，问题也被提出，而这些通常都由教师所为。

让我们来考察一种类型交流的结构，即引导性交流（eliciting exchange）。它通常由三个动议组成：“开始”、“回答”和“反馈”。例如：

教师：好的，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把那个食品都吃掉吗？

学生：为了强壮。

教师：为了强壮。好的，为了强壮。那么，为什么要强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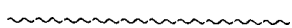
教师的第一次发声（contribution）是一个开始动议（initiation move），学生的发声是一个回答，教师的第二次发声的第一条线索是

反馈；第二条线索是另一个开始动议。请注意：一次发声（“表达”）可以由不止一个动议构成。反馈的持续存在假定了教师有权力评估学生的表达（在一个学习的环境之外，人们很少敢做这样的事），并表明：许多课堂话语都是关涉“学生知道什么”的测验，并按照学校所制定的标准来训练学生表达出有关的事情。

一个动议可以由一个或更多的行为构成。辛克莱和库尔萨德为课堂话语区分了 22 种行为，其中有些行为（诸如“投标” [bid]，此时某个孩子或许是通过举手的方式要求回答的权力）是这种话语类型所特有的。其他的则不那么独特：例如，一个引导性交流的开始动议包括一个“引语”，而一个指导性交流的开始动议则包括一个“指示”。



批判的方法之不同于非批判的方法的地方，不仅在于描绘了话语实践，而且在于揭示了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揭示了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



“窗帘没有拉上”可能是寻求确认，要求某人拉窗帘，或者只是提供信息）。辛克莱和库尔萨德涉及到被他们称之为“情景”（situation）和“语言成分结构学”（tactics）的东西，用以决定一个句子在一个特殊的话语中的功能。前者带来相关的情景因素：例如，如果孩子们知道讲话在课堂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么老师的一个陈述句（“你正在讲话”）可能就被解释为一个停止命令。和拉博与范歇尔（见下文）一样，辛克莱和库尔萨德提出了一些解释性规则，它们既说明了句子的语言形式，又说明了情景因素。“语言成分结构学”涉及的是一个句子在话语中的序列位置对于它的解释的影响。例如，“这或许不同于那位女士的观点”这样一个陈述句——在一系列引导性的交流中，

行为是功能性的范畴，不是拘泥形式的范畴，而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它们和语法的形式范畴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语用学中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见莱文森，1983 年，利奇和汤姆斯，1989 年）。众所周知，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例如，一个疑问句（一个“语法疑问”既可以是一个引导性句子，也可以是一个指示性句子（比如“你可以拉上窗帘吗？”）而一个陈述句（“语法陈述”）可能是它们中的一种，或一个“告知的”行为（例如，

它跟在一个反馈之后（即在人们期待一个开始动议的场合下）——很有可能被解释为一个引导句，尽管存在着下述事实：大部分陈述句都不是引导句，而大部分引导句都是疑问句。

辛克莱和库尔萨德的框架的力量在于它的开创性方式，以此方式，它关注对话的有系统的组织属性，并提供了描述这些属性的方法。它的局限在于缺乏话语的发展变化的社会指向，对于解释也不够重视。这些局限可以与他们对材料的选择联系起来：他们侧重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话语模式，他们的材料没有反映现行课堂实践的多样性。这使得课堂话语看上去比其实际情况更加带有同质性，并通过把它弄得像是惟一种实践的途径，使得占统治地位的实践成为顺理成章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话语只是“在那里”，是可以得到解释的，而不是通过与别的可能的实践相竞争的过程才被放置在那里的，不是具有特定意识形态（例如学习过程和学习者观点）“介入”的东西，不是有助于维持社会内部的特定权力关系的东西。简言之，辛克莱和库尔萨德的方法缺少一种发展变化的社会指向，因为它没有考虑权力关系如何构成话语实践，没有考虑将课堂话语历史地置于社会斗争和社会变化过程之中。当代课堂实践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多样性；人们想知道他们所描述的传统的课堂话语为什么会处于压力之下，它正面临的危险又是什么。

资料的同质性也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课堂话语的矛盾状况，偏离了可能产生的解释的多样性。看看这个来自库尔萨德的例子（1977年，108）：

教师：你认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你笑什么？

学生：没什么。

教师：什么？

学生：没什么。

教师：你没笑什么，什么都没笑？

学生：没有。

实际上，好笑的是“因为他们不”思考，就好似他们处在他们可能不喜欢的地方，而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自命不凡的态度。

辛克莱和库尔萨德根据学生对于当时情景的错误解释来看待这事，所以把教师关于笑的问题当做是纪律性的，而不是意图中的对话。但是，诸如此类的例子也针对课堂话语的潜在的异质性，针对学校中课堂话语词库中的共存状态，它是文本的生产者和解释者需要说明的东西。这包含着对话语过程的注意，解释也好，生产也好，都是如此，而辛克莱和库尔萨德强调的是作为话语产品的文本（尽管“语言成分结构学”范畴包含着对解释的某种注意）。这也使他们作为分析者的立场成为有问题的东西，因为分析者与其说是仅仅描述文本，不如说是解释文本。在声称要描述他们的材料时，辛克莱和库尔萨德实际上不是用一种以教师为出发点的方式对其做出解释的，即：例如通过把学生看作是“误解了”教师的意思的途径，而或许不是打算回答教师的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的途径，难道不是这样吗？“没什么”毕竟也是模棱两可的：它可能意味着“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使我在这里发笑。”这就给他们的框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它迫使有关表达功能的决定（像语义学最近的著作所揭示的那样 [莱文森，1983年]）不仅仅是模棱两可的东西，尽管表达（本身）往往真的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的意义不是可以被清楚地确定得了的。

谈话分析

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是这样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是由一群自称为“民族方法学者”（ethnomethodologists）的社会学家发展起来的。民族方法学是社会学的一种解释方法，它侧重于作为一种熟练技能的日常生活，侧重于人们用来“生产”它的方法。民族方法学者往往避免一般理论，避免关于诸如阶级、权力或意识形态等概念的使用和讨论，这些概念是主流社会学所重点关注的问题。有些民族方法学者对于谈话特别感兴趣，对于交谈者用来制造和解释谈话的那些方法特别感兴趣（申肯，1978年；阿特金森和赫里蒂奇，1984年）。谈话分析主要关注对等者之间的非正式的谈话（例如电话谈话），尽管有些近期的作品已经转向了机构型的谈话，在那里，权力不对称表现得更加明显（巴顿和李，1987年）。谈话分析与辛克莱和库尔萨德的方法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它重视话语过程。因此，它既

更加重视生产，也更加重视解释。不过，如同我将在下面要论证的那样，它的解释概念和过程概念都是狭义的概念，谈话分析在它倾向于发现文本结构的方面，可以与辛克莱和库尔萨德（的方法）相媲美。

谈话分析已对谈话的各个方面做出了论述：谈话的开始和结束；话题如何被建立、如何得到发展和改变；人们如何在谈话过程中讲故事；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观点明确”（formulate）地谈话（例如，给出要点，说出他们所暗示的东西）。有关“轮流说话”（turn-taking）的作品，即谈话者在讲话时如何依次轮换的作品，已经特别引人注目和具有影响了。萨克斯（Sacks）、沙格洛夫（Schegloff）和杰斐逊（Jefferson）（1974年）提出了一套简单而又有力的轮换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一个“建构性轮换单位”（turn-constructional unit）完成的时候：谈话者以诸如一个复杂句、一个简单句、一个词组、甚至一个词等单位来建立他们的“轮换”，参与者能够确定这个单位是什么，并以极高的准确性预测它的完成时间。这些规则的顺序是：（1）现行的讲话者可以选择下一个讲话者；（2）如果不行，下

一个讲话者可以通过开始制造一个轮换来进行“自我选择”；（3）如果不行，现行的讲话者可以继续下去。萨克斯、沙格洛夫和杰斐逊论证说，这些规则能够说明谈话的许多可见特征：谈话者之间的重合发生了，但是通常是短暂的，轮换之间的许许多多变化都是在没有间隙、没有重合等等之类的环境下发生的。尽管这些规则具有普遍性，但是它们在诸如顺序和转折的长度方面允许相当程度的变化。

谈话分析极为强调谈话的“连续性含义”——即有关任何言词表达都将会限制可能随之而来的东西的要求。诸如提问一回答或抱怨一

~~~~~  
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是这样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是由一群自称为“民族方法学者”（ethnomethodologists）的社会学家发展起来的。民族方法是社会学的一种解释方法，它侧重于作为一种熟练技能的日常生活，侧重于人们用来“生产”它的方法。民族方法学者往往避免一般理论，避免关于诸如阶级、权力或意识形态等概念的使用和讨论，这些概念是主流社会学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